

26.32724
4911

告報團查勘物文北雁



版出局物文部化文府政民人央中

日八十二月二年一五九一

26.3
4

序

雁北文物調查團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次組織的規模較大的一個關於文物的實地調查研究的工作團體，它的這個報告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出版的關於這一方面的科學的調查報告。這個調查團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負責組織，團員共十六人，包括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閻文儒、宿白二同志，清華大學營建系的劉致平、莫宗江二教授，朱暢中、汪國瑜、胡允敬三同志，清華大學文物館的陳夢家、王遜二教授，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員會的趙正之教授，北京歷史博物館的傅振倫同志，北大工學院的李承祚同志，故宮博物院院張廣泉同志，和中央文化部文物局裴文中處長，王守中、王樹林二同志。以裴文中處長為團長，劉致平、陳夢家二教授為副團長。分考古、古建二組。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一日由北京出發，八月三十一日返京，一共工作了四十天。在這四十天裏，調查了大同雲崗石窟，山陰故驛村古城，應縣、朔縣的古建築，渾源李峪村出土戰國銅器的遺址，陽高古城堡和廣武的古墓羣，五台山的唐代木建築佛光寺，同時，還加以細密的測繪、攝影、記錄，並做些小規模的發掘工作。每位參加工作的專家和工作人員都不辭勞瘁的通力合作着，有了很好的成績。到了北京之後，很快的便由各位專家們把報告寫出，由裴文中處長編成了現在的這個總的報告。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工作報告。在這裏有許多經驗和教訓，值得作為今後工作的參考和依據或改進的基礎。

只有在人民政權的時代，方能有這樣的工作團體組織起來，才能這樣的得到各方面的通力合作，才能這樣的獲得地方負責幹部的全心的協助，使這個工作得到順利而有結果的完成。

在過去反動政權的時候，文物工作是不被重視的。無數的最可珍視的民族文化遺產——古物、圖書——均被無恥的買辦、官僚、商賈盜運出口，成為帝國主義的博物院或圖書館裏可驕傲的收藏品。一部分村鄉遊民們也勾結着古董販子，恣意的盜掘古墓，破壞古雕刻、古建築。隨着人民政權的建立，文物的保護工作也在加緊的進行着。但因為宣傳教育得不夠，在一小部分地區，還不免有意無意的盜掘或破壞的情形發生。甚至不時還有人在做着好意的或好奇的發掘工作。這也是足以破壞地下的古代文物的完整和有系統的研究，阻礙着科學的有目的的發掘工作的進行。我們有加強實地調查研究的必要。像五台山的佛光寺，是我國僅存的唐代木建築，是現有的最古的古代廟宇。許多同志們都關心着它的現狀。有好些人傳說，它已經在戰事中遭受了毀壞。我們必須切切實實的做一番實地勘察的工作。這一次雁北文物調查

團的組織，便是試做這個實地勘查工作的初步。根據了這個初步的經驗教訓，我們以後便可以更有有效的更有系統的到各地區去調查研究文物現況了。又這次勘查團的出發，對於中央重視文物的保護工作，也收到了相當有力的宣傳教育作用。在工作着的地區或在經過的地區，立即引起了當地人們的擁護、合作與種種的幫助。像這樣的勘查團如果有計劃的有重點的逐年出發工作，對於全國文物的保護與調查研究上，一定會收到更廣泛而深入的效果。

在過去反動政權的時候，有一部份所謂專家、學者們，往往是門戶之見甚深的。誰掌握了「材料」，誰就是「權威」。彼此之間，互相嫉視，互相排斥，互相攘奪。彼此各有一個地盤，誰也不允許侵入。形成了各系各派，甚至形成了一種無形的「門閥」。只知道爲了個人的名譽或虛榮心，個人的前途與利益觀點而從事於採集或研究。他們看不見全面，只見到一點一線。這在中國科學研究的發展上是一個很大的障礙。不能通力合作，不能彼此打通研究的範圍。永遠想不到學術是公開的，是應該充分的公開給人們享用的。自私自利的心理，阻塞了科學的發達與進步。甚至把持有「材料」並不進行研究，更阻礙着其他專家、學者們的進行研究。有的時候，對於本國的學者，專家們採取了深藏固拒的態度，連望一望他們的「材料」都是辦不到的，雖然他們對於帝國主義國家的所謂學者、專家們却是那樣的公開而殷勤招待着，充分的表現出半殖民地的買辦學者的面目。至於各個學術機關間的合作，那幾乎更是不可能了。他們是那末壁壘森嚴的各自獨立工作着。但隨着人民政權的建立，基本上已打垮了這種傳統的不良的作風，乾淨的掃清了門戶之見，澈底的肅清了學者、專家們的自私自利的心理，可以說是「重新做人」。一切研究的工作，都是爲廣大的人民服務的；一切研究的結果，都是爲廣大的人民享用的；一切採集研究的成績，都是要迅速而公開的傳佈於廣大的人民之間的。專家、學者們之間，開始懷着坦白而公開的心情，彼此互相合作着，互相幫助着；代替了嫉視的，是親切的友愛與熱情；代替了排斥的，是高度的通力合作的精神；代替了攘奪的，是彼此協商，彼此扶持，彼此批評的進步的方式。而各個學術機關也是充分的表現着合作互助的精神，充分的對於應該合力以成的工作，無不協力以從事，不分彼此，毫無人我之見存在。雁北勘查團的組織與工作，便是充分的表現着這種新的方向與新的作風。如果在過去，這個由好幾個學術機構的合作事業便不會圓滿完成，更不能有如此的愉快的、親切的通力合作的表現。這個表現，正象徵着新中國的專家、學者們的無限光明的將來。

在過去反動政權的時候，有的時候也曾做過若干勘查工作。但其結果大部分藏之於專家學者的個人胸中，懶得提筆

寫報告或者可以說不屑向人們做報告。往往隔了好久好久，不肯洩露出一點秘密消息。材料獨佔，古物塵封。像西北考察團的二萬多根本簡，爲了研究報告不會寫出來，連那末重要的材料，也被「保密」了二十多年而無緣與中國史學家們見面。這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雁北文物勘查團不僅辛勤的做了那末多的工作，而且迅速而負責的把報告寫了出來，向人們做了應該做的事。這便是新中國專家、學者們的爲人民服務，爲科學工作服務的最光榮的成績！我翻閱着，再翻閱着這末一本報告，心裏湧現出新中國科學界的光榮的遠景，和光明燦爛的將來。我懇摯的在這裏向參加雁北文物勘查團的諸位同志致敬，並向各個合作的學術機關表由衷心的感謝！

鄭振鐸 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寫於北京。

目錄

鄭振鐸：序

考古組報告

考古組旅行日誌	(一五七)
陳夢家：雁北考古旅行的收穫	(七)
王 遜：雲岡一帶勘察記	(一三)
裴文中：大同雲岡石佛窟對岸之史前遺址	(二一)
裴文中：大同高山鎮之細石器文化遺址	(二三)
傅振倫：山陰縣城南古城勘察記	(二五)
閻文儒：廣武和古城堡的漢墓	(五三)
裴文中：渾源縣李峪村廟坡之彩陶文化遺址	(九一)
宿 白：渾源古建築調查簡報	(九五)

古建組報告

古建組旅行日誌	(一二七)
劉致平：古建組勘察總述	(一三三)
劉致平：大同及正定古代建築勘察紀要	(一三六)
莫宗江：應縣，朔縣及晉祠古代建築	(一五五)
趙正之：五台山	(一七七)
裴文中：雁北文物勘察團之組織及工作總結	(二〇七)

序

雁北文物勘查團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次組織的規模較大的一個關於文物的實地調查研究的工作團體，它的這個報告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出版的關於這一方面的科學的調查報告。這個勘查團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負責組織，團員共十六人，包括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閻文儒、宿白二同志，清華大學營建系的劉致平、莫宗江二教授，朱暢中、汪國瑜、胡允敬三同志，清華大學文物館的陳夢家、王遜二教授，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員會的趙正之教授，北京歷史博物館的傅振倫同志，北大工學院的李承祚同志，故宮博物院院的張廣泉同志，和中央文化部文物局裴文中處長，王守中、王樹林二同志。以裴文中處長為團長，劉致平、陳夢家二教授為副團長。分考古、古建二組。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一日由北京出發，八月三十一日返京，一共工作了四十天。在這四十天裏，調查了大同雲崗石窟，山陰故驛村古城，應縣、朔縣的古建築，渾源李峪村出土戰國銅器的遺址，陽高古城堡和廣武的古墓羣，五台山的唐代木建築佛光寺，同時，還加以細密的測繪、攝影、記錄，並做些小規模的發掘工作。每位參加工作的專家和工作人員都不辭勞瘁的通力合作着，有了很好的成績。到了北京之後，很快的便由各位專家們把報告寫出，由裴文中處長編成了現在的這個總的報告。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工作報告。在這裏有許多經驗和教訓，值得作為今後工作的參考和依據或改進的基礎。

只有在人民政權的時代，方能有這樣的工作團體組織起來，才能這樣的得到各方面的通力合作，才能這樣的獲得各方負責幹部的全心的協助，使這個工作得到順利而有結果的完成。

在過去反動政權的時候，文物工作是不被重視的。無數的最可珍視的民族文化遺產——古物、圖書——均被無恥的買辦、官僚、商賈盜運出口，成為帝國主義的博物院或圖書館裏可驕傲的收藏品。一部分村鄉遊民們也勾結着古董販子，恣意的盜掘古墓，破壞古雕刻、古建築。隨着人民政權的建立，文物的保護工作也在加緊的進行着。但因為宣傳教育得不夠，在一小部分地區，還不免有意無意的盜掘或破壞的情形發生。甚至不時還有人在做着好意的或好奇的發掘工作。這也是足以破壞地下的古代文物的完整和有系統的研究，阻礙着科學的有目的的發掘工作的進行。我們有加強實地調查研究的必要。像五台山的佛光寺，是我國僅存的唐代木建築，是現有的最古的古代廟宇。許多同志們都關心着它的現狀。有好些人傳說，它已經在戰事中遭受了毀壞。我們必須切切實實的做一番實地勘查的工作。這一次雁北文物勘查

團的組織，便是試做這個實地勘查工作的初步。根據了這個初步的經驗教訓，我們以後便可以更有有效的更有系統的到各地區去調查研究文物現況了。又這次勘查團的出發，對於中央重視文物的保護工作，也收到了相當有力的宣傳教育作用。在工作着的地區或在經過的地區，立即引起了當地人們的擁護、合作與種種的幫助。像這樣的勘查團如果有計劃的有重點的逐年出發工作，對於全國文物的保護與調查研究上，一定會收到更廣泛而深入的效果。

在過去反動政權的時候，有一部份所謂專家、學者們，往往是門戶之見甚深的。誰掌握了「材料」，誰就是「權威」。彼此之間，互相嫉視，互相排斥，互相攘奪。彼此各有一個地盤，誰也不允許侵入。形成了各系各派，甚至形成了一種無形的「門閥」。只知道爲了個人的名譽或虛榮心，個人的前途與利益觀點而從事於採集或研究。他們看不見全面，只見到一點一線。這在中國科學研究的發展上是一個很大的障礙。不能通力合作，不能彼此打通研究的範圍。永遠想不到學術是公開的，是應該充分的公開給人們享用的。自私自利的心理，阻塞了科學的發達與進步。甚至把持有「材料」並不進行研究，更阻礙着其他專家、學者們的進行研究。有的時候，對於本國的學者，專家們採取了深藏固拒的態度，連望一望他們的「材料」都是辦不到的，雖然他們對於帝國主義國家的所謂學者、專家們却是那樣的公開而殷勤招待着，充分的表現出半殖民地的買辦學者的面目。至於各個學術機關間的合作，那幾乎更是不可能了。他們是那末壁壘森嚴的各自獨立工作着。但隨着人民政權的建立，基本上已打垮了這種傳統的不良的作風，乾淨的掃清了門戶之見，澈底的肅清了學者、專家們的自私自利的心理，可以說是「重新做人」。一切研究的工作，都是爲廣大的人民服務的；一切研究的結果，都是爲廣大的人民享用的；一切採集研究的成績，都是要迅速而公開的傳佈於廣大的人民之間的。專家、學者們之間，開始懷着坦白而公開的心情，彼此互相合作着，互相幫助着；代替了嫉視的，是親切的友愛與熱情；代替了排斥的，是高度的通力合作的精神；代替了攘奪的，是彼此協商，彼此扶持，彼此批評的進步的方式。而各個學術機關也是充分的表現着合作互助的精神，充分的對於應該合力以成的工作，無不協力以從事，不分彼此，毫無人我之見存在。雁北勘查團的組織與工作，便是充分的表現着這種新的方向與新的作風。如果在過去，這個由好幾個學術機構的合作事業便不會圓滿完成，更不能有如此的愉快的、親切的通力合作的表現。這個表現，正象徵着新中國的專家、學者們的無限光明的將來。

在過去反動政權的時候，有的時候也曾做過若干勘查工作。但其結果大部分藏之於專家學者的個人胸中，懶得提筆

寫報告或者可以說不屑向人們做報告。往往隔了好久好久，不肯洩露出一點秘密消息。材料獨佔，古物塵封。像西北考察團的二萬多根木簡，爲了研究報告不會寫出來，連那末重要的材料，也被「保密」了二十多年而無緣與中國史學家們見面。這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雁北文物勘查團不僅辛勤的做了那末多的工作，而且迅速而負責的把報告寫了出來，向人們們做了應該做的事。這便是新中國專家、學者們的爲人民服務，爲科學工作服務的最光榮的成績！我翻閱着，再翻閱着這末一本報告，心裏湧現出新中國科學界的光榮的遠景，和光明燦爛的將來。我懇摯的在這裏向參加雁北文物勘查團的諸位同志致敬，並向各個合作的學術機關表白衷心的感謝！

鄭振鐸 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寫於北京•

考古組旅行日誌

七月二十一日、由北京乘火車至大同。

二十二日、與察省雁北專署及大同市文教局接洽勘查必要手續。

二十三日、由大同乘大車至雲岡、下午考查各佛洞。

二十四日、上午至雲岡東南三里之史前遺址採集標本、下午由雲岡乘大車至高山鎮。

二十五日、上午至高山城西之細石器文化遺址考查及採集、下午至焦山寺。

二十六日、由高山鎮返雲岡，途中查看五官屯西之石佛窟。

二十七日、上午大雨、下午至上華嚴寺及善化寺。

二十八日、由大同乘火車至岱岳。

二十九日、由岱岳乘大車至故驛村（山陰縣）。

三十日

卅一日 勘查古城遺址及局部小規模發掘。

八月一日

二日

三日 開掘故驛村北新渠內之一古碑墓。

四日

五日、由故驛步行至沙家寺考查，當日返故驛村。

六日

七日 在故驛村候車（由岱岳雇大車）。

八日

九日、由故驛乘大車至廣武。

十日、查看廣武之古墓群及已沖破之坟墓。

十一日、查看古墓群以外之破墓。

十二日、查看新廣武附近之長城及古建築。

十三日、因雨未能出發。

十四日、由廣武乘大車返岱岳。

十五日、裝標本箱交火車站運京。

十六日、因雨未能出發。

十七日、由岱岳乘火車赴應縣，因河水暴漲，阻於應縣秦莊。

十八日、由秦莊至應縣城內，下午查看木塔及淨土寺。

十九日、由應縣乘大車赴渾源途中，晚宿於西辛莊。

二十日、上午由西辛莊至渾源縣城，下午至圓覺寺查看磚塔及永安寺。

二十一日、由渾源縣城乘大車至李峪村查看銅器出土地點及採集附近之史前遺址之各種遺物，當日返渾源城。

二十二日、上午由渾源城乘大車至下板坡，下午查看玄空寺。

二十三日、由下板坡登恒山至恒山廟，當日由下板坡返渾源城。

二十四日、查看渾源城內之文廟、永安寺及圓覺寺之磚塔。

二十五日、由渾源乘驢赴陽高古城堡，晚宿於大王村。

二十六日、由大王村至古城堡。

二十七日、查看古城堡村附近之古墓群。

二十八日、查看古城堡及靳家峪附近溝崖之剖面。

二十九日、由古城堡乘大車至陽高縣城。

三十日、查看陽高城內之雲林寺、永福寺及真武廟。

三十一日、由陽高乘火車返北京。

雁北考古旅行的收穫

陳夢家

此次雁北文物考古團考古組在察省雁北專區旅行了四十天，主要的調查對象可以歸納爲下列各項：

- (1) 山陰縣故驛村的「古城」；
- (2) 山陰縣廣武鎮和陽高縣古城堡的古墓；
- (3) 大同縣雲岡石窟的造像；
- (4) 大同縣雲岡南岸及高山鎮，渾源縣李峪村的史前陶片與石器的搜集；
- (5) 內蒙古境內「西番」小銅器的搜集；

但因為時間，交通工具和氣候的種種關係，本組的工作並沒有如所預期的完全做到。尤其是第五項，收穫極少。西番銅器小物件，在過去三十年間是由各大城鎮的古董商派遣「打鑼的」下鄉收集，然後再由北京做洋莊的古董商來收買，大批出國。因此此類銅器在國外的比流通在國內的多的多。近年因為沒有人去收買，打鑼的也不下鄉了。我們在大同市上竟然找不到幾件。

雲岡石佛的劫運，似乎已經中止。但石佛的毀壞除了被盜取以外，自然的風化剝削是很可怕的。若不加以適當的處理，有些處有坍塌之虞。我們當前的任務是用人力去阻止它們。有些造像的外表有許多近代惡俗的塗塑，是應該清除的。窟門的設置和石窟前築牆植樹，窟內內部的清除和整理，都是急切需要的。

我們到了故驛以後，馬上就發現所謂「被水壅沒的古城」的不確了。根據方志所載，地上的土牆當是金代的忠州城故址。然而在此廢址內，就所檢拾的陶片、瓦片和「半兩」「五銖」等銅錢來看，可以斷定爲漢代的遺址。在漢代，這裏當有許多規模不小的建築，一定是守邊駐兵之所在。由此去廣武，看到二百座以上封土很高的「亂塚」。有兩個被水沖開的墓，由鄉人所保存的出土陶器，可斷定爲漢代（可能爲西漢）的墓葬。這樣的墓，在陽高的古城堡也有。後者曾經日本人盜掘，其出土器物也是屬於西漢的。據王振鐸先生說，廣武漢墓可能是武將的墓，所以封土高，必是士卒羣力所堆成的。這是很可能的。

團長裴文中對於史前考古是國內有數的權威，因此這次史前陶器和細石器的採集，用時短而收穫最多。

此次行旅所至。所接觸到的，除了雲岡的北魏造象和遼金文化外，是先後多種的古代文化：

- (1) 細石器文化
- (2) 彩陶文化
- (3) 中國西伯利亞文化（鄂爾多斯文化）
- (4) 晉北銅器
- (5) 漢文化

這些文化都是在雁北範圍以內出現的。現在雁北所轄的境界，在明清屬於大同府。其地介於趙南北長城之間，自古為匈奴胡人出沒之所，所以是歷代漢族防邊戍兵所在。拓拔魏建都於此，遼金兩代以大同為西京，因此遺留下不少古蹟實物。這地帶自古以來為遊牧之地，故至今居民仍兼事畜牧。我們翻看志書，人物一項，武將為多。這些是這個區域內地理的民族與歷史的特色。我們今舉此區域內兩種具有地方性的銅器以說明之。

這區域內曾出土若干小青銅器，其特徵為鑄作成動物形的小物件，或以動物為圖案的主題。一般估人通稱之為西番銅器，以別於中原出土的純粹中國式銅器。西方學者以其與古代的塞斯安 Scythian 銅器相類似，故或稱之為遠東的塞斯安。瑞典學者以其多出於綏遠南部的鄂爾多斯沙漠地帶，故或稱之為綏遠銅器，或稱之為鄂爾多斯 Ordos 銅器。此等銅器又與西伯利亞所出者有密切的關係，故學者或稱之為中國西伯利亞銅器 Sino-Siberian。由於發掘，旅行採購，估客口述和集中銷售此類銅器的若干市鎮，我們可以略知它的分布情況：

青海——西寧（卡塞，下西河）

甘肅——民勤（即鎮番），慶陽

陝西——榆林，神木，高家堡（皆在陝北）

山西——偏關，河曲，馬廠（皆在晉北）

太原，太谷，平遙，介休，洪洞

綏遠——鄂爾多斯（綏南，西北至黃河，東南至長城）

包頭一帶

歸綏，和林格爾，托克托

集寧（即平地泉）豐鎮與涼城之間岱海

察哈爾——大同，陽高

懷安，柴溝堡，張家口，宣化

蔚縣

多倫

河北——遵化

熱河——赤峯，圍場

東北——瀋陽

海拉爾

除東北、西北外，其他各地集中在古代「漠南」內蒙古長城地帶，乃是匈奴、胡，蒙古民族遊牧之地，在先秦爲燕趙文化區域。因此，我們若逕稱此等文化爲「綏遠」或「鄂爾多斯」顯然是不大恰當的。

鄂爾多斯出土的羊頭小彎刀和西伯利亞明奴辛斯克 Minusinsk 出土的及安陽殷墟出土的頗爲相似。雖然我們還不能決定三者之中何者爲先，但三者之間的聯系是可想見的。戰國時代具有狩獵圖象的銅器，見于壺者最多，亦見于鼎豆鑑等器上；就其銘文可考的一二器，可知此等器作於燕與鮮虞。筆者傾向於相信此類銅器最初的流行區域當在出土鄂爾多斯的燕趙地帶。帶鈎在較古文獻中稱爲「師比」，亦是由此地胡人傳入於內地的。由上述三事，可知鄂爾多斯對於研究中原銅器與北土的邊地文化的關聯，實具有重大的意義。

在上述的區域以內另一種值得重視的銅器是李峪銅器。一九二三年春，在渾源縣西南李峪村的廟坡地方，農民高鳳山於雨後掘地，發現一坑銅器。由於鄉人的開掘不得法，當時即毀壞了一部分銅器。其出土完整的，一批在二十件以上爲估客于某購去，一批約十七八件爲縣長謝承恩追繳，歸存縣中。當時法國古董商人王涅克正在附近採購鄂爾多斯銅器，於夜間密與商人購買了二十多件，運往巴黎。其中約五件又轉售於英美德法瑞各處，王歿後由其妻保管着十五件，今在巴黎盧佛博物館。其他散在民間的，也有數件先後出國。政府追回各件，屢議公賣興學，中外商人爭購涉訟。抗日戰

爭前，此批銅器爲一山西軍人所有，轉押於北京一錢莊中，至今下落不明。

李峪銅器在中國藝術史上有極重要的位置。其他位不在新鄭銅器之下。它和中原銅器雖非截然不同，但其形制花文風格確乎有其特殊的地方性。舉例言之，李峪銅器最通行的網文，據筆者所知似乎和鄂爾多斯有若干關聯。這些網文後來也傳入了中原。李峪銅器羣是大略屬於同一時期的，不像新鄭銅器實包含了春秋初期與中期兩個時期。一九三五年在汲縣附近出土的邲王壺（今歸英國刻爾兄弟），其銘文記載了紀元前四八二年黃池之會，可考定爲春秋晚期器；因而我們可以確定李峪銅器也是屬於此期的，因爲它們花文的特徵是一致的。學者往往定它爲戰國式，實在是不正確的。一般學者又稱此類銅器爲李峪式，也是不妥的。就筆者所見，李峪式銅器也出土於太原平定和汲縣，在地圖上渾源平定汲縣三地正在一條南北直線上。所以我以爲稱它爲晉北式或趙式較爲妥當。此式似乎發達於晉北（古趙地）沿平定而至豫北（今平原省）。銅器形式的南移，恰恰符合晉國勢力的南移。春秋晚期，晉國已侵入於豫北的朝歌河內一帶，到紀元前四世紀三晉（韓趙魏）的都城都在中原了。洛陽金村的戰國墓，則代表了晉北式和南土楚式文化的混合。大略的說，春秋以前的文化是東西交流的多，春秋以後是自北自南而與中原交流。

上述兩種銅器（鄂爾多斯與晉北）的特殊地方性，對於我們分別中原銅器的特色以及春秋後中原銅器所受北土沙漠草原文化的影響，有很重大的作用。在此區域內的漢文化，是否也與其它內地漢文化有所不同，將來的發掘當可以有所啟示。

大同高山鎮的細石器文化和雲岡及李峪的彩陶文化，使此地區的居民遠推到史前。彩陶文化的發源地，至今尙無定論。細石器文化大約是中國北土（包括長城外及內蒙古）的一種特殊文化，其分佈的地域自東北呼倫湖附近札賚諾爾與安嶺至嫩江流域之龍江（昂昂溪）並及於松花江流域，在熱河的發展中心爲林西與赤峯。此文化亦曾到蒙古東部錫林郭勒盟，由此沿戈壁南至內蒙古長城地帶（包括張家口、大同和鄂爾多斯）。在大西北區域內，寧夏的烏里烏蘇東南，青海的西寧（朱家寨），甘肅的隴西地區（臨夏臨洮一帶），亦有發現。在新疆省內，分布亦廣。據裴文中氏的推測，細石器文化大約發源於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附近。此文化約起於中石器時代，迄於新石器時代之末或銅器時代。據筆者的推測，鄂爾多斯的時代似乎較晚，約在中國歷史上的商代，直到漢或更後。

如上則述，此地域的多種文化實包含了考古學上極爲豐富的寶藏。此行的時間甚短，只能作地面上的觀察與採集，

但我們所獲得的知識與實物，很有可觀。已便爲了將來大規模系統採掘作了初步的準備。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 燕東園

上文所述下落不明的十七件李峪銅器，後據徐森玉先生見告已在上海出現，有一部分已歸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又上述近于晉北式的平定出土銅器，係根據筆者往年在坎拿大多浪多博物館所見到的五件。現在在山西境內，可能還可以搜集到晉北式的銅器。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五日校後補記

